

中国解放战争时期 内蒙古骑兵史 (下册)

乌嫩齐主编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蒙古学文库》编委会组织编写

第四编 内蒙古骑兵第四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的历史，是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三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为解放内蒙古和全中国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以锡察乌三盟人民子弟为主组建的部队，自它创建伊始，即在乌兰夫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委、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内蒙古军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同其他兄弟部队配合，在全国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各个阶段中，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打退和粉碎了国民党多次重兵进犯，有力地保卫了锡察盟革命根据地，解放了察北、绥北广大地区。建国初期，这支部队在绥北、绥西等地区参加了剿匪作战，减租反霸，民主建政和改造起义部队等工作。这支部队在其六年中的峥嵘岁月里，经历了艰难坎坷的道路，付出了重大牺牲，承受了不少挫折和战斗失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终于战胜了强大敌人，完成党和人民期望与重托的各项任务。

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它的成长壮大，都和党的关怀与培育是分不开的，是和汉族兄弟部队特别是冀察军区、绥远军区的关怀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我们回顾与整理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历史资料时，永远不能忘怀的是，辽阔草原上的锡察乌三盟广大人民和察北、绥北、绥西的农民兄弟，对我四师的全力支持与爱护，没有这样一个鱼水关系，我们将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当这支部队创建初期，以乌勒吉敖喜尔、关保扎布为首的伪蒙古军第九师起义官兵中的一批觉醒了的革命

指战员，同锡察乌三盟人民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渴望民族解放的愿望，紧紧结合在一起，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锡察乌三盟人民，特别是察哈尔人民，为了支援我师扩兵，父送子，妻送郎，骑上自己的马，有的还另牵一匹预备马，带着自己的枪，蜂拥前来参军投武。这比历史上察哈尔地区蒙古族人民在林丹汗率领下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而暴动的民众，更为热烈和踊跃。这支部队在它的战斗经历中，所以能够多打胜仗，少打败仗，艰苦奋斗，作战勇敢，象一把短小的匕首一样震慑着敌人，逐渐成为保卫人民，打击敌人的一个铁拳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和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觉悟与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同样，这支部队在战争环境里，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千难百磨无所畏惧，是同我们后勤战线上全体指战员茹辛含苦，冒着敌人的封锁与禁运，千方百计为前方保障供给的汗马功劳分不开的。他们拉着骆驼赶着马车，不畏寒冬或炎夏，把各类物资送到前方，而他们自己连一包烟、一斤糖、一尺布、一卷绷带都舍不得用，统统都送到前方干部战士手里。不少同志在后勤战线上积劳成疾，重病缠身，甚至有的同志为了保护后勤物资，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更为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件浸透着汉族兄弟部队的阶级情谊和战斗团结的史诗，即一九四七年冬，汉族部队从北冀察根据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冒着枪林弹雨，全靠人背送来棉装，其中有些棉装还印有汉族战友们有血迹，有的还夹带着弹头和弹片。

特别是我们回顾与整理骑兵第四师历史资料时，永远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阵亡的副师长脑门达赖、三十一团团团长扎木舍楞、

三十三团团长图古舍、参谋长图门乌力吉同志等三百名战友。他们为了解放内蒙古和全中国人民，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载入史册。

内蒙古骑兵第四师的历史，是锡察乌三盟人民武装斗争的历史。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胜利，也培育和锻炼了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有战功载入史册，而且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为建国后开辟新区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输送了大量的少数民族骨干。

第一章 骑兵第四师发展沿革

(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

第一节 伪蒙军第九师起义和四支队的关系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毛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胜利的阶段。八路军总部发布了全线总反攻的命令。随着苏蒙红军向我国东北和华北的推进，日寇全线溃退。在华北地区，我晋察冀部队和晋绥部队，相继攻克了丰镇、集宁、张家口等敌占城市，并向归绥、包头等平绥铁路线上的人，展开了全线进攻。蒙奸德王、李守信等相继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与此同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队，从绥西河套倾剿东进，争先抢占平绥铁路线上的中小城镇，伪蒙古军总部参谋长宝贵廷抢先声明率驻归绥官兵，向国民党投诚效忠。

当此风云突变之际，驻武川县城北六十华里的六合营附近的

伪蒙军第九师师长乌勒吉敖喜尔（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工作，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同毕勒格巴图尔、阿拉坦嘎达苏同志一起，经第三国代表旺克夫派遣潜入伪蒙军中做地下工作），运用自己在伪蒙军第九师官兵中的权威和信任，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拉出伪蒙军第九师三个骑兵团、直辖骑兵团（一个团）和驻百灵庙的伪蒙军防卫六师关保扎布、田福指挥的一个团，共五个团二千人，携带数门山炮和八辆汽车，开赴乌盟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宣布起义。举起“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旗号，打死拒捕的日本教官野村，扣捕了日本教官香川、永村二人。同时，派人寻找活动在乌兰花附近的第三国际地下工作人员哈尔夫，但未见下落。便三次派人赴大青山和格根庙（红召，现归卓资县管辖一个乡）寻找八路军联系；均被围困乌兰花镇的鄂友三部搜获。后又派卫队队长超鲁去百灵庙取得了和苏军联系。苏蒙军代表来乌兰花之后，也急于找八路军联系。于八月下旬，派出了一个召河人，把乌勒吉敖喜尔同志的亲笔联络信和苏蒙军的俄文信，一同放入马鞍孔内填好涂了油漆，伪装当地喇嘛，直赴武川东格根庙（红召）找八路军。途中恰遇绥蒙政府领导人杨植霖和毕勒格巴图尔、塔拉等同志，商定在乌兰花东韭菜沟会面。当即由乌勒吉敖喜尔同苏军代表赴韭菜沟面谈。由绥蒙政府决定成立番号为“绥蒙第一军第一师”的部队，任乌勒吉敖喜尔为师长，并发了委任状。商谈后确定，伪蒙军第九师起义的部队开赴商都县集结待命。起义部队于八月底到达了商都县红格尔图一带待命。杨植霖、张达志、毕勒格巴图尔等同志也随即到达商都。为了澄清乌勒吉敖喜尔等同志与共产国际的组织，苏军驻商都的代表布尔久克少校，让乌勒吉敖喜尔同志去张北同苏军司令商谈。经再三据

理交涉，终于按斯大林的战时指令，照东欧方式解决，即失掉关系的地下工作人员所掌握的伪军和游击队，先缴械，后联系，官兵不按俘虏待遇；经联系证明确属地下工作人员指挥的部队，则再发还武器，成立地方部队。据此，到商都后确定，收回武器，人员集中到德王府整训，后又送到乌兰巴托。

乌勒吉敖喜尔同志率领伪蒙军第九师的起义，并非事出无因的，事先在思想上、组织上是做了准备的。至一九四四年秋，乌勒吉敖喜尔、毕勒格巴图尔（曾在晋察冀军区任侦察科长）和阿拉坦嘎达苏等同志，即在伪蒙军中已培养和掌握了一批骨干力量，因而一九四五年春，派毕勒格巴图尔同志找姚喆等八路军领导人，请示伪蒙军第九师起义，接受八路军指挥抗击日寇，并要求八路军帮助伪蒙军九师妥善安置家属。后得复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日寇势力仍很大，待机行动。经过是这样：毕勒格巴图尔给阿拉坦嘎达苏捎来了暗语信，称：“你们借的牛，现在不要还，上秋归还”，因而一直等到同年八月十日才付诸行动。由此可见，早在抗日时期，西部区伪蒙疆军政内部就有我地下活动，而通过他们积极联络和组织起来的力量，到了关键时刻，就成为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然而，伪蒙军第九师的起义，亦非一帆风顺。当该师撤离六合营进驻乌兰花镇，争取同八路军联络时，国民党鄂友三部三千余众包围伪蒙军第九师，软硬兼施，企图诱降伪蒙军第九师。但乌勒吉敖喜尔以婉言应付并拖延国民党的诱降使者王某（中将衔）的劝说，驱逐了又一次煽动投降的马文斌，争取时间同绥蒙军区领导取得了联系，使敌人阴谋遂告失败。事后，国民党绥远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鄂友三转报武川县县长收复乌兰花经

过情形的代电，充分证明了乌勒吉敖喜尔率伪蒙军第九师起义的庄严行动。今据内蒙古档案馆所藏敌伪档案，将该代电有关内容摘记如下：“职当机将各自卫团分驻于乌城南北三面，一面威胁，一面派干员持函入乌联络并诸方劝告数日来该伪师长乌勒吉敖喜尔对于我均籍词应付毫无诚意，同时暗与奸军联系于八月二十八日获得该师长与奸军函乙件随电抄呈（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于莎县本署总发第43号）”。敌行署代电附有被国民党截获的乌勒吉敖喜尔于八月二十二日给格根庙八路军的亲笔信，亦充分证明，乌勒吉敖喜尔同志率领伪蒙九师起义的坚定立场和敌我分明的态度。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乌勒吉敖喜尔、毕勒格巴图尔同志率领起义的官兵，大部赴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集训。同年十二月下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局国际主义帮助下，提供武器、被服和军马鞍具，选拔一百二十人组建了游击大队，于一九四六年元月中旬进驻锡盟苏尼特右旗南部交界处的查干宝格都（现商都县吴家村）。当时蒙古提供的装备有：冲锋枪十二支、德制轻重两用机枪四挺、捷克式步枪每人一支、子弹每人六十发，排以上干部每人发手枪一支，另带战备子弹四十万发。所组建的一百二十人，编为一个连四个排。连长为武能齐、一排长超鲁、二排长那木吉拉、三排长图古舍、四排长阿尔太。上有师级架子，司令员乌勒吉敖喜尔，政委关保扎布，参谋长扎木舍楞，供给处长道尔吉勒格，军医巴图敖其尔。回国后，当即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主席乌兰夫同志和晋察冀军区接洽关系。在一次有乌兰夫、蔡树藩、曾涌泉、段苏权、乌勒吉敖喜尔以及苏方驻晋察冀军区的顾问尼古拉也夫在场的会议上，决定这支部

队由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晋察冀军区双重领导，部队番号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并确认乌勒吉敖喜尔、关保扎布等同志的领导职务。部队主要任务为负责保卫从化德到二连的与苏蒙的联络通道，以保晋察冀军区与蒙古之间的运输线。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改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四支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改为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十一师。一九四六年一月将一个连的兵力扩建为近八百人的骑兵支队。察北七分区的供应户头上也列为“蒙古支队”，以此明确了领导关系与供给关系。通讯联络方面，察北七分区配发了一部电台和机要、报务人员，同锡察工委、冀察军区保持联络。一九四六年九月晋察冀军区撤出张家口以后，便将晋察冀军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联络电台交由我师负责保卫。于是该电台负责人高特布和他的电台，到一九四八年年底解放张家口后才撤回晋察冀军区。

第二节 骑兵四师番号及其序列沿革

（一）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三月，部队番号称：“内蒙古人民游击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承德举行的“四三”会议后，改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支队长为乌勒吉敖喜尔，政委为关保扎布、参谋长为扎木舍楞。四月由武能齐接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李文精，供给处长为道尔吉勒格，卫生处长为巴图敖其尔。下设两个大队（架子团），第一大队长为扎木舍楞，第二大队长为图古舍。在查干宝格都、大西沟、格化司台等三处设新兵训练营地。

于一九四六年春，开始扩军充员，到十月撤离查干宝格都时，

两个大队共编五个连，第一大队辖一、二、五连，第二大队辖三、四连。另，供给处下设一个辎重连。第一大队配备高兴嘎为副大队长，政工员吉儒木图，参谋长巴音巴图，政治处主任王宏烈。第二大队配备副大队长阿尔太兼参谋长（后由图门乌力吉接任参谋长），政工员达瓦，政治处主任肖成义。

（二）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起，四支队升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十一师。师长乌力吉敖喜尔，政委关保扎布、副师长恼门达赖，参谋长武能齐，政治部主任李文精，供给处长道尔吉勒格，卫生处长巴图敖其尔。

下辖两个团改为三十一团、三十三团。三十一团团团长扎木舍楞，政委吉儒木图，副团长高兴嘎，参谋长巴音巴图，政治处主任王宏烈，辖一、二、五连；三十三团团团长图古舍，政委达瓦，副团长阿尔太，参谋长图门乌力吉，政治处主任肖成义，辖三、四连。

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商都县阮家村战斗中扎木舍楞、图门乌力吉二同志阵亡后，由武能齐兼任三十一团团团长，那逊乌力吉接任三十三团参谋长。

于一九四七年八月，毕勒格巴图尔任师副政委，原火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十一团政委，吉儒木图改任团参谋长，巴音巴图任副团长。李文精兼任三十三团政委，达瓦改任师教育科科长，达瓦嘎日布任副团长；后李文精调离，由贾通书任三十三团副政委。敖特根接替三十一团团团长，玛席三任副团长。

（三）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部队番号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改称四十一团，三十三团改称四十三团。此时，察北地区成立北线指挥部，十一师归北线指挥部指挥。

师职主要负责人未变动，武能齐任副师长，杨桑扎布任参谋长，原火任政治部主任。

四十三团，在宝源战斗图古舍同志阵亡后，由贺希格任团长，王宏烈任副政委，范子明任政治处主任，贾通书调任四十一团任政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成立锡察军区，我师师长乌勒吉敖喜尔改任锡察军区司令员，关保扎布调离，毕勒格巴图尔升任十一师师长兼政委。

（四）一九四九年五月，内蒙古军区部队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我十一师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辖十团、十一团，并代管独立团（起义部队），后又增编十二团（原锡盟保安团）。

师长兼政委毕勒格巴图尔，年末旺丹任副师长，乌力吉那仁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杨桑扎布。

十团副团长德木其格、巴音巴图，副政委贾通书，参谋长超鲁，政治处主任拉喜扎木苏。

十一团团团长贺希格，政委王宏烈，参谋长玛席三，政治处主任官布色楞。

一九五〇年春，十团，团长布仁巴雅尔，政委贾通书；十一团，团长骆长胜，政委王宏烈（入党校）；十二团，团长赵维新，副政委达瓦，参谋长双宝。

（五）一九五一年至五二年六月，骑兵四师兼乌兰察布军分区，师长毕勒格巴图尔，盟委书记兼政委韩是今，副师长旺丹，副政委韩明正、乌力吉那仁，参谋长赵英，副参谋长葛瓦，政治部主任云一立。十团团团长贺希格，政委贾通书；十一团，团长骆

长胜，政委布仁巴雅尔，副团长那音泰，政治处主任牛宝祥。

于一九五一年秋，十二团编散后调入其他单位。

第三节 打仗扩建结合，协助乌盟分会 和陶集县清匪建政

一九四六年一月进驻查干宝格都伊始，即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盟分会和陶集县、土木尔台内蒙古游击大队的领导李文精、李新民、王弼臣、梁锦绣等同志接头，研究解决粮草供应和帮助分会、陶集县开展工作。支出分出两排人马分驻土木尔台镇和四子王旗五井庙。在这一阶段，国内形势乌云翻腾，恶浪滚滚，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蒋军不断进犯解放区，正孕育着一场内战。我晋察冀、晋绥野战军围攻绥包二城的部队撤离后，敌十二战区鄂友三、宝贵廷、曹凯、陈秉义和石玉山等骑兵，纷纷从平绥铁路和绥北方面窜过来，赵大义、张孝武等股匪经常出没于陶林、商都境内，搜刮钱粮，骚扰平民百姓。当时支队既无充足的粮草给养，又缺马匹装具和生活物资。兵马不足问题尤为突出。另一方面，队领导鉴于人民群众经历日伪长期统治之后，炕无铺席，衣不蔽体，捉襟见肘，生活困难重重的局面，提出了扩军练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人民的方针和清剿土匪，发展生产，保护人民的具体措施。从蒙古回来的一百二十人编组为两个大队。进驻五井庙的扎木舍楞同志指挥一大队，分担剿匪或租征粮草和捐马任务。第二大队由图古舍同志指挥各扩兵组赴西苏、正黄和察盟西部，宣传人民自卫求解放和扩兵反蒋工作。在这个时期里，供给处按照自力更生的原则，在查干宝格都办起

了一个裕蒙利民的“裕蒙商店”，进了茶布烟糖油盐酱醋等日用品，方便群众，团结了群众。当时缺乏人手的情况下，由陈笑如、刘宗汉、周明等同志的艰苦工作，在群众协助下，磨坊、油坊、酒坊先后办起来。部队自己种些小麦、油料发展了生产，保障了部队生活品的供应。

于五月底前，两个大队分担的任务都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段，支队进行了几次小战斗。大恼包、堂地（陶林北）重创宝贵廷匪部一个连，毙伤三十余人。特别是哈布其尔庙战斗，支队长乌勒吉敖喜尔利用巧计，只用六十人的兵力，击溃了鄂友三第十二旅六百余人，毙伤五十余人，粉碎了敌人向我牧区的进犯，大振了我军民的革命斗志，大灭敌人的反动气焰。这一春又相继消灭了几小股土匪，为民除了害。这段时间，图古舍同志从察盟西部扩回一百余新兵，朝克斯冷同志从西苏旗扩来六十名，图布丹同志从正黄旗扩来五十名，第一批新兵，补充了第一大队两个连，开始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从张家口军政学院分配来的第一、二批干部担任了军事政治教员。新兵教育从基本制式教练和射击训练到利用地形地物及班、排进攻等战术训练。政治课主要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心内容的两党两军的对比以及内蒙古民族的解放与全国革命的关系等等。后经察盟招回来的新兵，分三批带回来。编训后，补充了第二大队两个连，供给处一个辎重连，另组建一个第五连和警通排。至此，两个架子团基本配满。新兵武器只以察北分区拨给的九九式枪和老套筒，还有少量的几挺轻机枪和掷弹筒，每个人配发的子弹也不够一个基数，多少不一。但战士们的士气很饱满，决心从战场上补充。

第四节 发展党的组织，配备领导核心

四支队于一九四六年十月，撤离查干宝格都之前的十个，党员极少，干部力量也不足。特别是扩兵后干部力量颇感短缺。在这一段，从张家口内蒙古军政学院分配了三批，人数不超过三十人，都安排了连职以上工作，大都到连、团任职，一部分在司政后三机关工作。整编了土木尔台游击大队后，李文精同志为首调进来五名干部，从巴乌大队调进王宏烈、肖成义、巴音巴图、图门乌力吉和官布色楞等同志。加之从外蒙古回来的一百二十人中，30%左右的人任团、连、排职工作，又从扩回来的知识分子中调了三十名左右，这样，来源于各方面的干部，大体一百一十人许。党员干部不到4%。因此，政治工作干部绝大多数是非党干部，团员也没有。所以，四支队建队初期无论干部力量或者党的组织，都是在政治部主任李文精同志直接领导下，边建边培养，边培养边发展的方式，根据工作和战斗表现与觉悟，逐步发展起来的。

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同毕勒格巴图尔同志又从蒙古返回来二十九人；乌兰浩特军大几次分配来的干部不到五十名，其中一九四八年春末义都同志带队来的一批三十六人，是最多的一次补充的干部。于一九四七年秋后，才大部团职政工干部换成了党员，但军事干部党员仍很少。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前，只有政治部主任李文精同志是党员，他和李新民二同志介绍发展了几名党员。又自巴乌大队派来了蒙族干部王宏烈、肖成义（均为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员）和官布色楞等党员同志。张鲁、赵俞廷等汉族老党员也在四支队协助工作了一段。一九四七年夏，以冀察军区派来了原

火、贾通书、范子明等同志补充了党的领导力量。至于一九四七年夏，大部团、连职干部的入党问题才开始解决。支队刚建立时的非党政委、指导员的状况，从一九四七年秋开始，由原火、李文精同志分别替换了三十一团和三十三团的原非党员政委。之后，开始逐步解决部队党的建设，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发展壮大，经历了既自己积极发展些党员，又从上面要些党员，一步一步地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完成了党对部队领导的过程。这也是内蒙古各个部队初建时的一个特点。

虽然支队当时党的基础很薄弱，但政治工作和军事纪律是很严明的。在驻屯整训扩编阶段，由于纪律严明，干部战士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平时深居简出，秋毫无犯。稍有违者，严明惩处。如驻段家村的一大队一连兽医奸污妇女被告发后，就地处决了。加之，战斗勇敢，战绩颇佳，好名声很快在农村牧区传播开来。

第五节 锄奸反特，打击民族上层反叛

一九四六年春联合会乌盟分会主任李新民同志转来乌兰夫同志口头指示，四子王旗协助德瓦根栋（伪国大代表）已私通傅作义率全旗兵马叛变，令四支队即日派人除掉。支队接受指示后，恐硬性动武德瓦根栋不易活捉，且又乘机有逃跑的可能性，部队也会出现伤亡，故须智取。为此，支队长乌勒吉敖喜尔先只派武能齐、图古舍二人带四名战士以联络名义直赴德瓦根栋官邸，他本人只带三十余人在哈布其尔庙附近接应。这次突然出击很顺利，活捉德瓦根栋和当场抢获该匪即将吞食的傅作义送去的联络信和

委任状，其下属亦无言以对，归顺我们整编，重新组织了由宝音毕力格同志为首的旗小分队。事后将德瓦根栋送交联合会处理。至此，乌盟分会李新民、胡尔沁毕力格、墨尔根巴特尔等同志开始开展工作。同次被捕获的美蒋大特务格力金太，送交陶集县王弼臣、梁锦绣等人后，关押期间越狱逃跑。同年夏秋之交，正黄旗保安大队副队长任德胜率先带十六人叛变投国民党石玉山部。之后又派人进来煽动全大队叛变。其信腹白云和、李守田里应外合，妄图拉走全大队人马向国民党石玉山部投降。掌握了这个大队要叛变投敌情况的我方云林秀、官布色楞二同志求援四支队解除武装。支队领导即派出第一连连长那木吉拉、副连长布赫带一个连人，在云林秀、官布色楞二同志的协助下，利用早操点名机会，一举收缴了一百二十人的武装，狠狠地打击了带头叛变的正黄旗保安大队的反动力量，也为附近各旗保安队敲了一个警钟。

九月放弃张家口之后，原伪蒙古军宝贵廷的新编十六军进驻陶林，不久派出“招降使”那巴达拉胡（原伪蒙军上校）来土木尔台镇劝降。一大队队长扎木舍楞用巧计解除了他的美制枪，押送在支队司令部。那达拉胡满以为凭旧关系，凭国民党一时的嚣张，十拿九稳马到成功了，未曾料到当时的四支队已不是昔日的旧军队，一勾便上当。这一国民党的特务，很快被押赴后方监禁起来。

之后，国民党派那巴达拉胡泥牛入海无消息，又派出了正牌特务鲍显亭来劝降。当时正遇奎壁同志路经四支队，研究后立即决定处决了这个特务。不久，国民党的“宣抚使”马鹤天乘车带兵来陶林附近诱降，但敌人策反瓦解我部队的阴谋，一一被粉碎了。四支队的这种爱憎分明，对敌狠，对人民亲的坚定立场，远近农

村牧区的农牧民群众无不称赞四支队是一个好队伍。原伪军一名留居西苏旗的上尉军官嘎尔迪，偷偷地给鄂友三的十二旅买军马，支队拦路截获，没收了军马，召开村民大会宣布罪状后，立即枪毙示众。对明来的敌人以牙还牙，寸土不让。但对各盟和旗的反动上层和旧人员，暂时还在解放区一方，尚未叛变投敌者，如对镶黄旗总管穆格登宝、正黄旗总管达木林苏荣的儿子普日来道尔吉、西苏旗德王的侄儿阿拉坦瓦其尔公爷以及上都旗、镶黄旗、西苏旗、四子王旗等各旗喇嘛界上层和僧俗人员，本着稳着多数，改造利用，团结对敌的原则，作了统战工作。虽然这些反动上层，在国民党全面军事进犯时；在威胁利诱下，纷纷投入敌人的怀抱，但在一九四六年内制止了我后方牧区内部反动势力形成联片堡垒，威胁我后方贝子庙。并且通过一些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动员支前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至少在扩军支前工作中不敢作梗了。当时，支队内部对统战工作认识上是有分歧的，一种认为不应该和这些人搞统战，早晚是隐患，不如及早除掉了好；另一种认为，穆格登宝、阿拉坦瓦其尔找上门来，说跟我们合作，是真是假，本着死马当活马治，治过来了对革命有利，治不过来除掉他，至少暂时对我们没有害处。事实证明，在敌进我守的复杂形势下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暂时可以争取的一些潜在的敌人。直至一九四六年底，稳住了多数上层，留在解放区内，接受我方的改造教育，对我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地方武装，打击罪恶昭著的蒙奸恶霸，起了有益的作用。

第二章 配合战略防御 保卫锡察革命根据地

(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七月)

第一节 敌我态势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实行大规模地军事进攻。不久，在我华北战场北冀察哈尔、绥远地区，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统率的敌十二战区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五军、三十六军和暂编第一〇四军以及鄂友三、石玉山、陈秉义、安恩达、曹凯、宝贵廷等骑兵旅，相继东进，侵占张家口、集宁、丰镇、多伦、张北、宝源、康保、化德、尚义、商都、陶林等地。察绥地区各县大地主、恶霸和多股土匪组成了人数不等的大小保警团和还乡团。锡、察、乌三个盟的二十几个旗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穆格登宝（镶黄旗总管、国民党察盟保安司令）、诺尔布扎那（太仆寺右旗总管、国民党蒙边剿匪副司令）、色仁那木吉拉（太左旗总管、国民党蒙边剿匪副司令）、雄诺敦都布（伪锡盟盟长、国民党锡盟保安司令）以及四子王旗协理贡扎布（伪国大代表）、东苏旗王爷根登丕勒、协理仲乃、西苏旗阿拉坦瓦其尔公（德王的侄儿）、协理那逊巴雅尔，还有胡图仁嘎、嘎西、其楞、何文瑞、丹巴和反动活佛巴格辛格根、喇嘛腾等等，举起“脱离内战委员会”的招牌，先后公然投敌叛变，被国民党分别封为“保安司令”、“剿匪司令”等官衔，弹冠相庆，准备为国民党效忠卖命。在我主动放弃张家口、集宁、丰镇等中小城市后，锡察地区各旗人民在党和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下，积极动员起来，全力支援十一师和十六师，